

抚育我成长的摇篮

○李慧芬（1958—1960 建筑）

弹指一挥间，我已步入耄耋之年。每当收到清华校友总会寄给我的《清华校友通讯》、校刊寄来的《新清华》时，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抚育我成长的摇篮，勾起我对考入清华那段往事刻骨铭心的回忆，对在清华学习、生活的眷恋。那是对我一生的思想、行为影响最深远、最丰富、最愉快、最难忘的经历。

豁出一条命也得考清华

我从小生活在北京的一个贫民区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留下最恐惧的烙印就是每逢刮风下雨，我家的左邻右舍经常会发生房屋倒塌，砸伤人、砸死人的惨叫、嚎哭。再加上自家的屋里，大盆小罐接漏雨，外面雨停了，屋里仍然要滴滴嗒嗒漏半天。我总想，这些人什么时候才能住上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子呢？解放后，每当我看见一幢拔地而起的新楼，就非常兴奋。在我心目中能盖房子的人是最伟大的。我立志长大要当建筑工程师。

我在女四中高中毕业了，高考填报志愿，每人可报9个志愿，我找遍全国各大学的招生简章，只有6个大学有土木建筑系，唯独清华大学建筑系和土木工程系是两个系。建筑系要加试美术，每年只收几十人。《中国青年》杂志曾有一篇报道，截至1957年入学清华大学建筑系，工农家庭出身的只有曲淑凤一人。我心高气盛，雄心勃勃，第一志愿就报清华大学，选择我憧憬已久的建筑学专业，第二、第



一九五八年考入清华的李慧芬

三……第六是天津大学等校的土木建筑系。其他志愿不报了，有人好心地劝我，建筑系考不取，怎么办？师范院校取分低，又免费吃住，还是应填报上。我当时说：“考不取清华建筑系，大学就上不了，早点儿参加工作。”

1958年7月，天气酷热，干旱无雨。家里学习环境差，我每天去学校复习功课。学校已放假，基本没人，安静极了。哪个教室开着门，我就进哪个教室，随便找个位子埋头看书。一看就是一天，不吃也不喝，下午四五点钟才回家。高考的前一天，我依旧在二楼的一间教室复习功课。刚看了一会儿书，天就黑了，好像到了晚上六七点，我连忙往窗外看，原来是乌云密布下起了小雨。心想这下凉快了，就挪到窗口稍亮点的位子上继续看书。这雨越下越大，竟然下了一整天，天真的黑了，饥肠辘辘的我，想豁出淋湿衣服，赶紧跑回家。可是，我舍不得这一大包书被淋湿。正在心急火燎之际，透过玻璃窗，远远看到对面楼前，在雨中站着一个人打着

伞东张西望的人，仔细一看是我的妹妹。我高兴得一溜烟似地跑到妹妹面前，她说，她已在这里等了两个多小时。我顾不上解释，飞快地跑回家。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窝头，喝了两碗面疙瘩汤，就睡觉了。半夜12点多，我突然肚子痛得不得了。父亲把我送到医院，经急诊、化验，诊断得了急性阑尾炎，必须立刻做手术，否则有生命危险。这时已凌晨3点，距离去参加高考还有不到5个小时。我执拗地摇头，死活不同意做手术，我答应父亲，第一门考不好，后边就不再去考了，马上回医院做手术。医生无可奈何，让父亲签字“后果自负”，打了一针，吃了一点儿药，就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医院。

因是全国统考，我的考点在离家比较远的北京市25中，共考6门，需三天。那时，家里困难，连杯牛奶也买不起，没有出租汽车，家里也没有人送我去考场，只好雇了一辆三轮车拉去。早晨喝一碗绿豆汤，中午不回家吃饭，下午考完再坐三轮车回家。第一门考语文，基础部分答得很顺，作文题目《难忘的一件事》，平时也做过。下午考数学，题目也不难。人得喜事精神爽，心里一高兴，疼痛似乎减轻了许多。第二天仍然觉得考题很简单，很轻松地就答完了。可谁知，第三天下午考最后一门外语时，本应考90分钟，只答了不到30分钟，三天没吃饭，带病坚持考试的我，终于坚持不住了，不由自主地昏倒了，被急救车送到了考场附近的第四医院。当我醒来时，已经做完手术，躺在病房里。往窗外一望天已黑，周围没有认识的人，我鼓起勇气，去找大夫问个明白。不料，刚下床走了两三步，一头栽倒在病房门口，又昏倒了。当时被缝合的伤

口就绷开了，又送进了手术室。第二天，我懊悔极了，觉得自己太不像话了。给考场、医院添了这么大的麻烦，害得家里找了我一夜。人家考6门，我只考了5门，白白拼了三天命，大学是肯定考不上了，伤心的泪水潸然而下。一方面心情不好，另一方面营养不良，别人做这种手术一般不超过七天就出院了，而我住了二十多天，伤口不愈合，出不了院。

一天下午3点多钟，妹妹来给我送录取通知书，我不让她进病房，还神经质地赶她走。我害怕看到不录取的通知书，病弱的我根本经不起那样的打击。她大声说是录取通知书，我不信。当时病房住了七八个人，纷纷去看，果然是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，当我真真切切地看到确实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录取通知书，竟然放声大哭起来。憋在心里的苦辣酸甜一涌而上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

第二天，在我的恳求下，医生同意我出院，但每天还要到医院换药。这次得病共花了400多元，相当父亲半年多的工资。但是，当父母亲听说，北京市女四中200名毕业生中，只有3人考取清华大学，他们也感到很欣慰。我之所以能被录取，我猜想可能前5门分数很高，可能有考场记录，也可能是清华大学招生办参考了我高中毕业时八门主课全部是5分（当时实行5分制）的全优成绩。那时不能查分，也没有走后门的。我这个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孩子，虽然差点儿搭上一条命，但最终考取了清华大学建筑系。

难忘在清华大学的岁月

走进清华大学挺拔巍峨的校门，水木清华的玲珑典雅，工字厅的蔚然清秀，科

□ 荷花池

学馆的学术气息……震撼了我。这就是我心中的圣殿，工程师的摇篮。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成为清华大学最优秀的学生。

1958年是建筑系自1946年成立十多年来招生最多的一年，共录取100名。系主任是我仰慕已久的建筑泰斗梁思成先生。入学后，系里指定三名同学为大班（年级）班委，分别为班长、学习委员、文体委员，我被指定为学习委员。我心想，全国各地考入这么多出类拔萃的尖子生，还有当年从工农速成中学优秀学生中录取的十几名调干生，他们有工资，比我们大五六岁，都是中共党员，怎么就指定我这病号当学习委员呢？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千方百计地做好学习委员的工作。

我因阑尾炎伤口尚未痊愈，每天都要同学用自行车驮着我，去食堂、教室，去校医院换药。特别是课间换教室，从校园西区到东区，同学推着自行车跑。我给刚认识的同学添了太大的麻烦，心里别提多么过意不去了。

1991年适逢清华大学80周年校庆，建4校友组织回母校聚会，当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和大家阔别31年的我出现在大家面前时，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想当年你捂着肚子，一瘸一拐地来报到……我们还用自行车驮你呢！你可不能忘了我们……”可见，我当时的狼狈相，给大家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。那亲密无间的同学情谊，几十年来一直温暖着我，常在我的梦中浮现。

建筑系建筑学专业，每年三个学期，其中两个学期在校内学，一个学期到大型建筑工地实习。在学校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的校训，严谨务实、科学求真精神的熏陶下，加之自己学习目的明确，学

习动力足，刻苦努力，各门基础课、专业课成绩都是5分。在工地实习中我学过钳工、木工、瓦工。1959年5月，我已在北京市和平里住宅工地，通过砌墙速度、质量和独立完成发璇（砖砌弧拱）的考核，获得三级瓦工证书。和一般学校紧张的书本学习有天壤之别，我们每周有一段时间学画画、一天参观，可以自由安排。我们都有颐和园年票，经常去那里写生，北京各种类型建筑、景点我们都去过，系、校、市图书馆都有我们的足迹，一天到晚非常轻松愉快。

学校经常组织政治学习、社会活动，既注意以人为本、因材施教，又注意个性发展，让同学们在丰富多彩的学习、活动中学到了知识，铸就了团队精神和突出的凝聚力。

入学后不久，校刊《新清华》要从新生中聘请一批学生记者。数量不多，平均每个系不到一个。我在高中时是校团委宣传委员，一直办小报、黑板报，文笔也有一定基础，我被选中了。国庆节刚过，我就得到了“采访证”，证上有我的名字和证号，还盖着校团委宣传部的红色椭圆形图章。这样，我就有了在校内各处采访的通行证。在紧张的学习、班级社会工作之余，我经常花费许多时间采访、写稿，报道建筑系的有关情况。1959年，《新清华》按报道内容成立了几个记者组，我和土2杨玉成、自4丁文魁等5人被分配在体育组。

在校运动会、首都高校田径运动会、国防体育运动会等大小运动会上，我们不但采访、录音，还做现场报道。我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，还经常做现场解说。同学们常常在报端看到我的名字，在广播

里听到我的声音，在民兵训练、学术讨论等各项活动中看到我忙碌的身影。在天安门游行前休息时我也不忘采访。

清华大学要求学生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，特别重视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，体育老师马约翰一年四季都是身着白色单裤褂，活跃在大操场上。蒋南翔校长响亮地提出“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”。入学后的前三个月，我不能上体育课，也不能参加每天下午的体育活动。马约翰老师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存在，我却成了他的“粉丝”。过了半年多，他才发现跑、跳、投掷成绩都不错的我。1959年春季校运动会，各项比赛我系都有人参加，唯独自行车田径赛没人。我心想，每周我从清华骑自行车回家，一趟就是两个多小时，便鼓起勇气报了名。这次比赛我竟然得了田径场3000米女子组第一名，成绩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，超过原校队女运动员。比赛结束后，我被吸收到自行车校队，队长是建0孙慧生。

1954年10月成立清华大学体育代表队，学校有专门的运动员餐厅，交同样的伙食费，比普通餐厅吃得好很多。在国家困难时期，普通同学粮食定量，每月男生30斤、女生28斤，运动员不定量，可以吃饱。每天下午4点至6点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。自行车队男8人，女3人，经常去爬香山，骑车到市里先农坛体育馆，进行赛车场训练。我们还骑车从清华大学出发，当晚住天津大学，第二天再回清华，来回近300公里。那次路上，一个男同学的自行车出了故障，只好由一个男同学骑一辆、推一辆，另一个男同学带一个人。



2014年11月，自行车队老队员在西体欢聚，右1为李慧芬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1960年元旦北京八大院校自行车100公里公路赛举行，那天风很大，顶风骑了不到半小时，已经满身大汗，我迅速地脱掉运动衫、裤，穿着印有清华字样的背心、短裤，两条腿像上了弦似的，速度更快了。不料又骑了20多分钟，我的腿肚子突然转筋，痛得不得了。陪同保护的工作人员发现后，劝我下车揉揉。当我听到“清华加油！清华加油！”的沿途拉拉队喊声，当我想到邱少云、黄继光等战斗英雄，怎么也不肯下车，但却泪流不止哭起来。当我接过别人递给我的水壶喝了两口，竟然随手把水壶扔到了路边的水沟里。事后想起这件事我就不好意思。通过拼搏，清华大学获得团体第一名。我的成绩达到一级运动员水平。

2014年11月，学校举行清华体育代表队60周年庆祝活动，和大家分别54年后，我们再次相会，每个人都精神矍铄，不失老运动员风采，都已超额完成“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”的目标。

1960年，党和国家决定从全国重点高校中选拔一批政治条件好、学习成绩优

□ 荷花池

秀、身体健康的同学充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（代号总字 9042 部队，因坐落哈尔滨市，简称哈军工）。清华在15个系中每个系选2人，共30人。我清晰地记得，那是1960年8月3日（因为那天是我生日）下午两点，系领导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9042部队录取通知放在我面前，和蔼可亲地对我说：“祝贺你，从现在开始你参军了。”并提出两条要求：一是不要告诉家里，怕家里拖后腿；二是不要告诉同班同学，怕影响期末考试。不用带任何东西，8月5日早晨5点学校二校门有车送。我像做梦似的，一点也不兴奋，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，在清华园里转来转去，然后无精打采地骑自行车回到家。我告诉父母学校组织去实习一段时间，就不用花家里的钱了。从没说过谎话的我，竟然语无伦次了。

8月4日回到学校，向《新清华》记者组、自行车校队的同学告别，因为没说为什么，大家纷纷议论，都用惋惜的眼神苦口婆心地劝我，不要离开他们。我心里的苦辣酸甜，难以言表。回到宿舍，一向

活泼热情、快言快语的我，像变了一个人。偷偷给和我家住得比较近的女同学陈若新写了一张字条，请她在我走后，收拾我的行李、衣物、书包等送回家。把字条放到她枕头下边，我就爬上双层床的上铺——我睡了两年的地方。我两眼望着天花板，思绪万千，辗转反侧，久久不能入睡。我多么舍不得离开我豁了一条命考入的清华大学，我多么想当一名建筑师……在党与国家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、志愿发生矛盾时，遵照清华大学“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”的教育，我毅然服从了党和国家的需要。

8月5日，天蒙蒙亮，我生怕吵醒熟睡中的同学，轻手轻脚地只身一人溜出了宿舍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顺着我的脸颊流下，喉咙哽咽着差点哭出声来。我不敢再回头，径直跑到集合地点。两辆大轿车清晨5点缓缓开出清华校门。车上鸦雀无声，直到登上北京——哈尔滨的火车。

虽然我在清华园里学习、生活只有两年，现今所回忆起的事恐怕只是一鳞半爪，但是，清华的通才教育和校风、

学风深深地影响了我。在我离开清华60余年的学习、工作生涯中，在每个岗位上，无论做什么，无论顺境逆境，清华对我的教育、鼓励、支持和鞭策都是无时无刻、有形无形地存在着。学习、工作中取得的每一点成绩，无不是受益于抚育我成长的摇篮——清华大学的锤炼。



清华被选调入“哈军工”的同学们合影，后排右1为李慧芬